

學術著作◆大專用書

儒學與日本模式

樊和平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儒學與日本模式

樊和平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儒學與日本模式

作 者／樊 和 平

責任編輯／張 玉 蓉

校 對 者／吳 燕 萍 · 吳 明 勳

出 版 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7055066（代表號）

傳 真：7066100

劃 標：0106895-3

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發 行 人／楊 榮 川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 版／和鑫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東陞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 訂／信成裝訂行

中華民國84年7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1001-9

基本定價 6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儒學與日本模式 / 樊和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民84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1-1001-9(平裝)

1. 儒家 - 評論 2. 日本 - 文化

121.207

84006169

目 錄

前 言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合璧	1
一、「現代化」的三大世界性課題／3	
二、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6	
三、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11	+
四、日本的啓示／15	
五、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9	
第一章 儒學與日本文化的生態	25
一、日本文化的背景與基因／27	
二、儒學與日本文化的生成／32	
(一)接納與認同／33	
(二)融合與涵受／38	
(三)儒學的日本化／41	
(四)近世日本儒學的衰落／50	
三、儒學與資本主義／51	

(一)文化衝突中的日本儒學／52

(二)儒家倫理的回歸／53

(三)「儒家資本主義」／55

四、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的價值系統／56

(一)儒家思想與日本政治／56

(二)儒家思想與日本倫理／61

(三)儒家思想與日本宗教／67

五、儒學與日本文化的活力／70

(一)日本儒學的特色／70

(二)儒學與日本文化的生態／78

(三)日本儒學的活力／84

第二章 「和魂漢才」 93

一、家族倫理與社會結構／95

(一)家族本位與縱式結構／95

(二)縱式結構與橫式結構／102

(三)家族式集團主義／107

二、儒家倫理與日本文化的原理／112

(一)安份守己／112

(二)恩與報恩／118

(三)義 理／130

三、中、西、日「自我」設計的比較／135

(一)人情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自我」設計／135

(二)個人主義與西方文化的「自我」設計／138

(三)集團主義與日本文化的「自我」設計／143	
(四)「自我」的比較／147	
第三章 「和魂洋才」	151
一、明治維新與日本科學的興起／154	
(一)維新前日本的文化觀念與科技狀況／154	
(二)明治維新與日本文化的轉型／161	
(三)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比較／166	
二、近世儒學與科學精神／168	
(一)科技史與日本科技史／168	
(二)江戶時代的科技史及其文化背景／170	
(三)日本近代科技的發展及其文化背景(1868-1925)／176	
(四)現代科技與政治文化(1926-1965)／182	
三、啓示與思考／185	
(一)近代中日對西方挑戰的不同回應／186	
(二)科技發展與日本的近現代化／190	
(三)儒學與日本的科技文化／195	
第四章 「土魂商才」	199
一、《論語》與算盤／201	
(一)「《論語》與算盤」／202	
(二)義與利、仁義與富貴／205	
(三)人格與修養／211	
二、倫理秩序與經濟營運／214	

(一)倫理秩序與文化心理／214	
(二)經濟秩序與經濟管理／221	
三、儒學與日本經濟發展的活力／233	
(一)文化與經濟／233	
(二)儒學與日本經濟的活力／235	
第五章 日本精神與日本模式 ······	241
一、日本精神／243	
二、日本模式／256	
(一)儒學與資本主義／256	
(二)儒家經濟倫理與日本的經濟發展／262	
(三)倫理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結合／266	
結 語 儒學與中國的現代化 ······	271
一、儒學與未來社會／273	
二、中國人文資源的開發／277	
三、倫理經濟與商品經濟／285	
(一)倫理經濟的原理／285	
(二)商品法則與人情法則／291	
(三)倫理經濟與經濟倫理／295	
(四)文化力的開發與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299	
後 記 ······	319

參考書目 323

前 言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合璧

一、「現代化」的三大世界性課題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尤其是海外中國學者，在對西方現代化進行反思和中國現代化進行探索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共識：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面臨三大共同的課題：人與自然衝突問題、人與人衝突問題、人內心的不平衡問題。這三大問題困擾著現代化，也決定著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方向。近代以來有關人與自然關係的理念所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對立，把自然僅僅看作是征服、改造、利用的對象，然而當科學發展到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時候，生態平衡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給人們這種守舊的文化觀念還以有力的報復，構成人與自然的新衝突。這種衝突甚至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新理念。西方現代化是建立在個人本位與生存競爭的文化價值觀念基礎上的，這種價值觀念使得西方社會在科技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帶來人與人間的劇烈衝突，或者說，科技經濟發展的本身就是以人們間的衝突為代價的。科技經濟高速發展而帶來的社會關係的急劇變化，極易導致人之內在精神的失衡。在科技發展的同時，人自身遭到了冷落，科技成為人的異己，甚至異化的力量，從而導致人內心的不平衡，產生孤獨、苦悶的心理。這些矛盾在西方現代化的開端就隱然存在著，只是隨著現代化的不斷發展，在後現代化的過程中愈演愈烈，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矛盾可以說是現代化的內在矛盾，它們同時也是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如果不吸取西方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很可能重蹈

西方的覆轍。正因為如此，它們才構成現代化的三大世界性課題。

其實，這三個問題並不只是現代化的課題，而是人類文化一開始就碰到的基本問題，或者說是世界文化一直致力解決的問題，只是當社會進展到現代的時候，這三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同時出現在人們面前，而要求建立一種健全的、整體的文化理念與文化精神。對此，我們可以從梁漱溟先生關於世界文化系統的劃分中得到一些啓迪。梁先生從「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樣法」「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註1）的前提出發，認為人生有三大問題：人對物的問題、人對人的問題、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人生的三大問題決定了文化的三種路向：理智、倫理、宗教。由此產生西歐、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型。他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的『塞恩斯』與『迪謨克拉西』兩大異彩的文化」（註2），所以西方文化貢獻了科學和民主；「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註3），其文化的內核便是和諧的意識，認為「人自身是和諧底，人與人是和諧底，以人為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和諧底」。（註4），所以中國文化貢獻了儒家的道德與理想；「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註5），所以貢獻了至高無上的佛教。這三種文化路向分別解決了人生的三大問題：西方文

註1、2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24頁。

註3、5 同上，55頁。

註4 《中國文化要義》，145頁。

化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中國文化解決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印度文化解決人與自身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這三種文化是一個歷時性的過程，又是一個共時性的結構，三者既有高低之分，在時間之流中本應順次發生，但事實上又平面展開為西、中、印三種文化系統。那麼，這三種歷時性的文化又何以變為共時性的結構？他的回答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是由於聖人的指引才上了人生的第二路與第三路。梁漱溟的這種文化理論具有合理的內核，它揭示了人類文化必須解決的三大課題，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生命的關係問題看成是遞次上升的有機文化系統與文化生態，並以此為根據，說明西、中、印文化的特色。但其侷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實際上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關係看作是彼此分離的過程，並把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作為文化的最高形態，具為形而上學的抽象性，不過這種抽象性是對抽象發展的世界文化體系的概括和反映。

文化作為「人化」總是在特定的方面，從特定的方向上解決人生問題，生長文化精神。這就是某種文化的民族特色，也是它對人類文明的獨到貢獻，這些絢麗多姿的文化系統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問題同時擺在人們面前，表現得越來越尖銳。科技綜合、文化融合的時代趨勢，要求揚棄先前文化體系的抽象性與形而上學性，建立一種同時能盡性合理地調節、處理這三方面關係的整體、健全的文化體系與文化精神。這種文化體系與文化精神的內涵是什麼？我認為它既不是單一的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也不是梁漱溟所說三種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整合與合璧。

二、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

為了論述具體，我們不一般地談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而是把科學精神作為西方文化精神的內核，人文精神作為中國文化精神的內核，以此透視兩種文化精神的內涵與實質。

何謂「科學精神」？這裡的「科學」有兩層含義。一是作為獨立學科的科學，即自然科學，二是由此引伸出的作為價值目標和價值判斷標準的科學。兩種含義既相區別又相聯繫。由於自然科學追求對象的客觀性，規律的確定性，人們便將它上升，抽象為一個普遍的概念。把所有遵循、追求、合乎客觀規律的都稱為科學。從詞性上說，前一個「科學」是名詞，後一個「科學」是形容詞，即「科學的」、「科學性的」。從這種區分出發，所謂「科學精神」也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科學精神是在自然科學基礎上形成的，以自然科學為源頭與範型生長出來的文化精神與文化價值系統，它的基本含義是「自然科學的精神」，確切稱謂是「自然科學基礎上生長出來的文化精神」。廣義的科學精神是由此抽象形成的精神特徵，即具有科學內涵與屬性，追求科學性的「科學的精神」，或「科學性的精神」，它已經撇開了自然科學的具體內涵，只是在符合客觀規律，追求客觀真理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判斷詞而使用。我這裡是在第一種意義上使用。顯然，如果在第二種意義上說西方文化是科學精神，那就意味著對西方文化的全盤肯定。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科學精神」的特性與實質是什麼？既

然「科學精神」是以自然科學為源頭、主體與範型的精神，這種精神的邏輯出發點與基本取向便是「物本」。科學精神首先是在人與物的關係，確切地說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產生與生長起來的，是「以物為本」的精神。它以自然為直接的研究對象，探索自然的內在規律，征服、改造自然。當研究的對象由自然轉向非自然領域時，這種精神的延伸又必然把一切自然化或物化，把一切對象包括人都還原成自然或物來研究，因而又必然導致或要求「物化」，否則便不合乎「科學」的基本要求，於是必然使人的規律同化於物的規律。在認識方法上，其最大的特點是主客體的截然二分，把包括認識主體在內的一切都對象化，使一切具有堅定不移的客觀性與對象性，反對主體的投入與作用。物本——物化——對象化就是這種科學精神的基本內核。這種文化精神當停滯於自然科學領域時其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它一旦走出自然科學，進入人文領域，侷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哲學上，它的最高成就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與形而上學。

科學精神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說是求真的精神，這種求真的精神有其內在的要素。它的邏輯出發點是自然，邏輯前提是把人等同於自然，認為萬物皆自然。西方文化的一個基本信念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要知道宇宙的本性，就能通曉人的本性，因而對人與自然不必加以分別的研究。但人與自然又是對立的，二者處於不斷的生存競爭中，因而主張人對自然的征服、開發與利用。這種信念造成兩種結果：一是泛科學主義，對世界的一切，包括自然、社會人生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疏解；二是致力於向外探索，探索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為人的生存服務。西方哲學一開

始就致力於探索構成萬物的始基即基本元素。泰勒士認為世界是由水構成的，赫拉克利特認為一切起源於火，德謨克利特則用思辨的方式發現了原子。凡此種種，人亦如此。這種科學精神到近代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由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發展到把一切都還原為物質，還原為自然。拉美特利「人是機器」的命題就是這種科學精神的集中體現，它構成西方文化最為根本的精神，也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形成尊崇知識、信仰科學的傳統，蘇格拉底「知識就是美德」的格言，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就是這種科學精神的體現。

科學精神在主體上的體現就是強調理性，以理性作為價值判斷的主體與機制。在它看來，只有理性才是客觀規律的主觀體現，是達到對客觀對象真理性把握的唯一途徑。希臘智者普魯泰戈拉斯很早就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命題。他這裡的「人」是理性的人，其實質是說「理性是萬物的尺度」。亞里斯多德更是明確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把理性作為人的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特徵。這種理性主義成為西方文化的一貫傳統，即使在哲學、科學成為神學奴婢的中世紀，神學家也是用理性論證神的存在，大陸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把「思」即理性作為自我確證的唯一條件，以至到現代形成各種唯理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學派。

正因為科學精神致力於對自然的開發與利用，在價值標準上必然以實用與功利作為價值的標準，並以實驗、實證作為認識的途徑和方法。正如科利斯·拉蒙特所說：「任何領域中知識的確立，都需要以觀察、反省、實驗和檢驗的方式花時間、動腦筋。」